



# 大学生诚信教育论纲

DAXUESHENG CHENGXIN JIAOYU LUNGANG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姚刚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

# 大学生诚信教育论纲

DAXUESHENG CHENGXIN JIAOYU LUNGANG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姚 刚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诚信教育论纲/姚刚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645-1683-3

I . ①大… II . ①姚… III . ①大学生 - 社会公德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 ①G64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3910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邮政编码 : 450052

出版人 : 王 锋

发行电话 : 0371-6696607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 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 : 14. 25

字数 : 200 千字

版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 ISBN 978-7-5645-1683-3

定价 :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 序 言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一提到道德，人们的内心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和崇高的感情，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地思索，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在这些人类无比敬畏和赞叹的道德法则中，诚信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之一。马克思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作为一种关系的存在物，维系这种关系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诚实和信用。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人们都喜欢诚实、守信的人，厌恶欺骗、不守信用的人。

毋庸讳言，“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是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道德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褒扬与传颂。直至今日，诚信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仍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所在。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受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原因影响所致，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在社会伦理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诚信行为，诚信的缺失对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期。在旧的道德规范体系被打破，而新的道德规范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的今天，价值的震荡和道德的滑坡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尤为突出的是不诚信行为的大量出现，因其现实利益的回报率大，又极易逃脱法律制度的制裁，进而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了仿效追随的榜样，形成了道德伦理上的诚信危机。

更有学者指出，在我国，“诚信”实在是眼下最匮乏的稀有资源之一，以至于有人客观而又无奈地总结道：信用污染已经“有幸”取得了与环境污染、权力污染平起平坐的资格，并称我国的“三大污染”。商人卖假货，会计做假账，国家公务人员做假数字，中小学生作文中大量出现假人假事，就连大学生中也出现贷款不还账、毕业做假证的欺骗行为，知识分子中抄袭别人作品

的现象也大有人在,信用污染已经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诚实、不守信已成为许多人不以为耻的行为!针对这种现状,我国上百万家企业响应全国工商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贸远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 27 家单位的倡议,签名支持把每年 9 月 19 日定为我国的“诚信日”。同时,社会诚信缺失的巨大危害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证明,我们不得不重提“诚信”,在学校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开展诚信教育。

诚信危机出现的原因错综复杂,涉及制度、文化、伦理、信仰、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诚信首先应是一个道德问题,是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同时,诚信教育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学校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还必须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和需要,通过法制建设和制度创新,来为诚信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监督机制。然而,我国对诚信缺失的发难是始于经济领域而非教育界,是当欺骗行为对经济生活构成了严重危害时,才首先引起经济领域有关人士对国人普遍缺少诚信品质的关注和重建社会诚信的呼吁!当诚信危机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时,教育理论界仍没有针对诚信道德教育给予理论上的应答,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教育理论思维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反应严重滞后了。《学记》有言,“禁于未发之谓豫”,“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这是教育过程中的基本原则,也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熟知的理论常识,因此,面对诚信危机的出现,教育理论工作者也难辞其咎。

大学生是社会中素质较高的群体,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会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产生极大的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品质缺失更是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大学生诚信教育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开展大学生诚信问题研究,绝不是简单的道德呼唤,而是要站在时代的前沿,通过汲取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精华,并吸收西方先进的“诚信”伦理观念和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现实社会伦理生活状态进行系统、理性的反思,进而界定“诚信”道德和“诚信教育”的当代含义,反思我国高校诚信教育的现状,提出实施诚信教育的基本策略,从而指导大学生遵守诚信道德,更加敦风化俗,并最终使大学生普遍达到真诚、守信的理想道德境界,为新时期高校开展诚信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姚刚  
2013 年 5 月



<b>第一章 中国诚信思想</b>	1
一、“诚信”的起源	3
二、中国诚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7
三、诚信的内涵	12
<b>第二章 中西方诚信思想的比较</b>	29
一、西方传统伦理文化中的诚信思想探析	29
二、当代西方信任理论研究介绍	33
三、中西方诚信观的主要异同	41
四、中西方诚信观比较的启示	45
<b>第三章 诚信教育</b>	50
一、诚信教育的缘起	50
二、诚信教育的提出	53
三、诚信教育的概念	55
四、诚信教育的地位	59
五、诚信教育的功能	63
六、诚信教育的载体	73

<b>第四章 大学生诚信教育</b>	82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特点	83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理论基础	86
三、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现实背景	89
四、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原因分析	95
五、当前大学生诚信教育存在的问题	108
六、诚信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13
七、当前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必要性	120
<b>第五章 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内容和标准</b>	128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内容	128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标准	143
<b>第六章 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原则与措施</b>	159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原则	159
二、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措施	164
<b>第七章 大学生诚信教育的保障机制</b>	193
一、学校诚信教育的制度保障	193
二、学校诚信效果的评价监督	205
<b>参考文献</b>	217
<b>后记</b>	219

## 第一章

### 中国诚信思想

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诚信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同时也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渡的关键时期,改革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伦理精神的深刻变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个体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充分展示自我与个性的风采。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自由与责任、独立与孤独、选择的困惑、人生意义的失落,等等。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规范法则逐渐失去效用,人们面对日常生活时略显无所适从——他们既无法获得来自他人的信任,也无法去信任他人。一个怪现象就是现在任何人都不愿听到别人说他“老实”“实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的潜台词就是“无能”和“傻瓜”!大多数人生活的压力也不再是能否生存下去,而是一连串的类似于这种奇怪现象的“尴尬”境遇与“烦恼”。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是一个生活范型发生根本变迁的社会,传统与习惯在剧烈的荡涤中被冲刷销蚀,原有



作为信任基础的安全感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改变,个人所面对的社会风险性突然增大,人们在这突然变化之下反思自己的存在及其交往方式,反思既有的观念与行为规范系统的合理性。”<sup>①</sup>这种反思也是对“既有的观念与行为规范系统的合理性”的拒斥。从我国的现实状况出发,这种反思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做“老实人”和“实在人”,与道德和崇高背道而驰,他们选择混迹于世,随波逐流!大量的这种出于怕受伤害(心灵与物质利益)的心理与自我安全的需要以及部分人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欲望驱动而采取的放弃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引起了人们日常行为和观念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以及相互间普遍的怀疑与不信任。“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遇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了人们广为接受的处世法则。当这种普遍的不信任、不诚实行为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并对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时,便形成了“诚信危机”。我国的学者有时也将这种现象称为“信任危机”或“诚信缺失”。

众所周知,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品德,也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一个人不讲诚信,最终将自食其果,遭到众人的遗弃,自绝于群体之外;当一个社会中弥漫着普遍的不诚信之风时,这个社会也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政治腐败、经济混乱、文化堕落……尤其是在被称为信用经济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诚信的价值已不仅仅在于道德范畴,更在于它的特殊的经济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影响恶劣、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因诚信而引发的诸如金融诈骗、制假贩假、高考舞弊等重大案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扰乱了经济秩序,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更败坏了社会风气,混乱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诚信缺失带来的种种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诚信,不仅仅是

<sup>①</sup> 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



一个简单的伦理范畴；诚信问题，也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领域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构建起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诚信，有效地扭转诚信缺失的局面呢？我国是有着优秀文化传统、从古代起就重视并讲求诚信的泱泱大国，注重诚信是我国古老而优良的道德传统。纵观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至约束皇帝的“君无戏言”，下至约束百姓的“言必信，行必果”，无不焕发着理性的光辉，诚信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源远流长。中国传统诚信理念有着丰富的内容，走过了漫长的发展之路。溯古鉴今，认真探索诚信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对于我们搞清什么是诚信以及如何在继承传统诚信的基础上推进现代诚信建设，促进理想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诚信”的起源

中国古代诚信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经秦汉及至宋朝时期得以巩固发展，明末和清朝时期进一步演化为经世致用之学。中国传统诚信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有价值的道德因素和内在的伦理精神，是需要当代人们加以领悟并予以传承和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为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的“诚信”一词，最初是由“诚”和“信”两个独立的概念逐渐演化结合而来的，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传统诚信。儒家在“诚信”这一道德范畴的形成中起了主导作用。

“诚”的概念是先秦时期儒家在《尚书》中首先提出的。《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当时主要是指笃信鬼神的虔诚。《周易·乾》中讲“修辞立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才能建功立业。这里所论及“诚”已摆脱了纯粹的宗教色彩，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由此，“诚”的概念在以儒家为主的道德学说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孔子强调“仁”，其“仁者爱人”的主张与“诚”的道德意义是一脉相通的。



孟子对“诚”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他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诚”是道德之源和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基本准则。荀子把“诚”作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之一，在孟子“诚”的思想基础上把“诚”从做人之道拓展为治世之道，认为“诚”是“为政之本”，把“诚”作为道德主体修养的关节点，“诚”被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宋代周敦颐认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在他看来，“诚”是不变的至善的道德实体，是一切具体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规范的渊源，它既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基础，又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来源，因此，“诚”是道德修养的基本范畴和最高境界。王船山则认为：“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这里，王船山的“诚”的概念是指形而上的万有的真实存在。

“信”的概念在春秋之前也和“诚”一样主要体现为对鬼神的虔敬，后经儒家的提倡，其宗教色彩逐渐淡出，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而且被人们更早地与为政之道结合起来。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出人际交往要守“信”，国与国相交也要遵守“信”，即“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sup>①</sup>。后来的儒家把“信”列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信”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立身处世所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伦理规范。先秦道家虽非道德论者，亦对“信”给予强调，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sup>②</sup>的论断。老子重视恪守信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sup>③</sup>。墨家则始终把“信”作为评价仁人的一条重要的道德标准，强调“志强智达，言信行果”<sup>④</sup>。

“诚”与“信”最早被组成词语连在一起使用是在《逸周书》中。

① 《论语·颜渊》。

② 《老子·八十一章》。

③ 《老子·四十九章》。

④ 《墨子·兼爱下》。



《逸周书·大匡解》中载有“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这里所说的“信诚”其实际含义就是“诚信”。而最先提出“诚信”概念的则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管仲。他认为诚信能够集结人心，使天下统一，强调“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sup>①</sup>。管仲进一步指出：“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sup>②</sup>也就是说，君主的好恶才在心里形成，百姓就已化为行动；刑罚还未施行，人民就已知道恐惧；奖赏未发，人民就已得到劝勉，这是实行诚信所期望的结果。战国末期的荀子是儒家代表中明确提出“诚信”命题的人。荀子说：“端悫诚信，拘守而祥，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sup>③</sup>就是说，诚实忠厚，谨受法度，明察事理，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困处边远地区，人们没有不信任的。他还认为真诚可信产生神明，虚夸荒诞产生祸乱，提出“诚信生神，夸诞生惑”<sup>④</sup>。

“诚”与“信”是可以互训的。《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诚”与“信”的，“诚，信也，从言从成”，“信，诚也，从人从言”。中国最早的一部典籍，也是五经之首的《周易》将“诚信”视作为人处世的根本所在，《系辞上》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教育家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sup>⑤</sup>，他把“言必信，行必果”<sup>⑥</sup>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老子也谈到“言善信”，也就是叫人说话算话。《大学》强调“意诚而后心正”，并将“诚意”作为指导和砥砺古代士君子进德修业的“八条目”之一。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是将“信”作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成为儒家所提倡遵守的最重要的伦理规范之一，失信于人也成了古代儒者最为不

<sup>①</sup> 《管子·枢言》。

<sup>②</sup> 《管子·立政》。

<sup>③</sup> 《荀子·修身》。

<sup>④</sup> 《荀子·不苟》。

<sup>⑤</sup> 《论语·为政》。

<sup>⑥</sup> 《论语·子路》。





齿的行为。宋代朱熹也认为：“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以上所列举的各家之言，都是将“诚”与“信”理解为可以互训的基本伦理规范。

从上面我们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与“信”的解释来看，中国传统伦理更注重“诚信”的价值理性，强调人的内在“诚信”道德的修养。无论是“诚”与“信”作为可以互训的基本伦理规范，还是作为本体论意义的“诚”，它们的人性论的前提假设是“人性善”，都强调个体的内在道德品质修养，遵循着中国的“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实现途径，而且都十分强调“慎独”和“内省”的道德修养方法。这种过分追求个人道德境界的理想和对伦理道德的依赖，一方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的特点与优势，它追求“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崇高道德境界，更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德意志品质的支撑。而且，历史上也确实塑造了不少的道德楷模，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sup>①</sup>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忽略和缺少必要的外在纪律束缚，尤其是制度层面的硬性约束缺失，也造成了“伪善”人格的成批复制。孔子就强调道德修养不是依靠外加强制，而是依靠自觉努力，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sup>②</sup>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sup>③</sup>这种伦理文化的一个严重恶果便是对人性中“恶”的一面认识不足和约束不够，人们很容易就能够做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更成为人们深信不疑的生活哲理，从而“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和“互相猜忌”便也能够渐染世风了。

① 《论语·雍也》。

② 《论语·述而》。

③ 《论语·颜渊》。



## 二、中国诚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尚书》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其中出现关于“诚”的记述，说明上古时代和夏商周时期已经有了朴素的诚信观的萌芽。虽然它强调要对鬼神虔诚，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却是古代诚信观念的起源，为我国传统诚信观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诚信观念基本得以确立。当时，儒、道、法、墨等诸家均表现出对诚信问题的重视，对诚信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阐述，其中儒家的著述最丰。著名思想家孔子把诚信看作是立国之基、为人之本、交友之道。《论语·颜渊》记载，其大弟子子贡曾向孔子求教为政之法。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把信放在治国的首位，鲜明体现了诚信政治的价值。同时，孔子也反复告诫弟子：“言必信，行必果。”<sup>①</sup>“与朋友交，言而有信。”<sup>②</sup>“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sup>③</sup>在孔子诚信观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五伦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sup>④</sup>进一步将诚信列为人伦道德的重要规范。孟子的五伦说概括出了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信”作为处理人际交往中的一条基本原则。此外，孟子还提出了“思诚”的命题。他认为诚是天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而“思诚”则是做人的方法和诀窍。《孟子·离娄上》记载：“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就对“诚”

① 《论语·子路》。

② 《论语·学而》。

③ 《论语·为政》。

④ 《孟子·滕文公上》。





做出了本体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规定。对诚信道德做了较为全面阐述的是荀子。他顺着孔孟诚信思想的客观方向,作了大跨度的迈进。荀子认为,诚信是个体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也是统治者的治世之道。强调社会各行业都必须以诚信为本。《荀子·不苟》中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荀子把诚看作是人生最高境界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原则,强调“诚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sup>①</sup>。相对于儒家的诚信观,道家更侧重于从“真”“信”两方面来追求诚信。老子认为人类最根本的道德就是真朴之德,主张“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sup>②</sup>。庄子把“本真”看作是精诚的最高境界,提倡顺乎自然、真实不欺的诚信品德。他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sup>③</sup>,对诚信有了新的理解。墨家则始终把诚信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推崇忠信之士。墨子说:“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主张依法治国的法家同样非常重视“诚信”这个道德规范的功能。商鞅就把“信”与“法”“权”并列作为治理国家的三条纲领:“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sup>④</sup>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强调诚是处事之根本,提出“巧诈不如拙诚”<sup>⑤</sup>;他还进一步指出:“小信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sup>⑥</sup>以此告诫君主也要以信治国。

通过先秦诸家关于“诚”和“信”的论述,“诚”和“信”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在秦汉时期得以确立和巩固,儒家思想也开始正式成为统治思想。随着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

① 《荀子·修身》。

② 《老子·四十九章》。

③ 《庄子·渔夫》。

④ 《商君书·修权》。

⑤ 《韩非子·说林上》。

⑥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的诚信思想得以继承和发扬。特别是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和推崇，作为五常之一的“信”，也由此而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心理之中，对后世产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

“三纲五常”是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建立的一整套周密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其中的“五常之道”即“仁、义、礼、智、信”。“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sup>①</sup>严格地讲，董仲舒所提倡的信，与先秦诸子所讲之信是有区别的。他的信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出发，强调臣民必须“至忠厚言，以事其君”。重在强调臣对君的信，以便于君对臣的管理。他还进一步要求必须以“礼”对这种信进行规范，即“好为大夫者，宜厚期忠信，敦其礼仪”。尽管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带有单向性，但他将信作为五常之一，加强了诚信道德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此后，“信”逐渐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重要道德准则，一方面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如臣对君诚；另一方面又规范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如朋友之间守信等，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诚信思想主要见于当时的思想著述、文学著述和史学著述等。例如著名的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著作《新论》中，就用大量笔墨，从哲学、史学角度论述了诚信道德问题。他说：“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无以立。”

诚信在唐代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诚信思想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臣轨》下卷“诚信章”中云：“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诚信者，即其心易知”；“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夫可以为始，可与为终者，其唯信乎”等。

自汉代以后，各朝继续继承关于诚信的论述。至宋明时期，随

<sup>①</sup> 《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之一》。



着理学的复兴,诚信再次获得人们的重视,并被上升到一种哲理化的层面。理学家们认为诚是天理的本然,是天人合一的基础,是人身心内外合一的根本,从而对“诚”的理解有了新的延伸和拓展。宋明理学家们不仅运用哲学思辨来阐发“诚”的内涵,而且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来阐述“诚”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认为“诚”是人们成人、成功的关键要素、必要条件和根本方法。比如,宋代叶适就把“诚”解释为“诚然”,即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规律,认为伦理道德应存在于实际事物之中。明末清初王夫之也认为“诚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sup>①</sup>,主张人们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而在元朝治理国家与推行汉化政策中,诚信伦理思想也被蒙古统治者所接受,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元朝名臣事略》中就记载有忽必烈对大臣充分信任的故事。

宋明理学关于“诚”的阐释,是一种天地一体的思想,“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生命个体的约束,达到一种合乎天道的境界,成为一种形而上的“诚”的存在。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认为“诚”是万物的开始,并且将宇宙观中的“诚”与道德观中的“诚”统一结合起来,建立了以“诚”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他在《通书》第一章中明确写道:“天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周敦颐还认为:“诚者,圣人之本”<sup>②</sup>,“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sup>③</sup>。在他看来,“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皆以“诚”为基础,因而特别强调“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则认为“诚”是宇宙天理的本然,在《中庸章句》中指出:“诚者,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就是说“诚”是天理的组成部分,客观世界是本然存在的。“诚”也是本然存在的,强调人们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

① 《尚书·引义》。

② 《通书·诚上》。

③ 《通书·诚下》。